

辽宁教育出版社



LIXING ZHENLI YU LISHI

理性·真理与

历史

〔美〕普特南 著

中国古代史学名著

59  
9

B712.59

2P539

哲学书系

LIXING ZHENLI YU LISHI

# 理性·真理与历史

[美] 普特南 著 李小兵 杨 华 译 陆杰荣 校



658241



A0930403



辽宁教育出版社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译出

当代大学书林  
理性、真理与历史

〔美〕普特南 著

李小兵 杨莘 译

陆荣杰 校

---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

字数:195,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插页:4  
印数:1—7,6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陈 我 责任校对:马慧 陈冰白  
封面设计:安今生 安迪

---

ISBN 7-5382-0582-9/B·8

定价:2.40元

## 《当代大学书林》编辑委员会

### 主任委员：

贾非贤

### 首批丛书执行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之江 王越男 安今生 刘顺德 刘瑞武  
陈 攸 俞晓群 贾非贤

### 特约编委：

王 前 朱水林 刘大基 周 山 张志孚  
张相轮 张鸿雁 孟宪忠 胡守钧 陆杰荣  
魏中军

## 编辑序语

近年来，出版界丛书热风吹遍大江南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套套丛书接踵而至，这种趋势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当代意识流。《当代大学书林》，也是在这块文化温床上破土而出，并将以自己的特色，跻身于丛书之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现代通讯设备已将信息的传播推向崭新的阶段。由此，地球变得狭小了。如果说在古代，闭关锁国还可以生存，那么在今天，一个国家如果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那将成为神话了。

在我国的封建时代，曾有几个王朝对外开放，使中华民族的文明传向世界，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本世纪初，五四运动的先哲们，打破了近百年的沉寂，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先进的世界观和优越的社会制度，我们本可以发扬五四精神，保持同世界的联系，以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去赢得世界。非常遗憾，“左”的错误和各种历史因素使我们自己关上了门。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世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图景。在改革、开放的十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

## 2 理性、真理与历史

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样令人鼓舞的背景下，以传播新思想、积累科学文化成果为己任的我国出版界，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我们有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悠久的历史历史传统，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体系的时候来到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都与其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面貌，常常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地方教育出版社，我们首先要为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服务。同时，我们愿意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正是出于这种职业责任心，我们确定了《当代大学书林》的出版计划。

《当代大学书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方针，有选择地介绍当代中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知识、新学科、新观点、新信息，力图在介绍世界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鉴别，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而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我们愿意为此而竭诚努力。

《当代大学书林》，要把那些卓有见地、敢于创新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纳入“书林”之中，并真诚地推荐

给高等院校广大师生，以期在大学的“选修课”、“专题课”、“系列讲座”的教学中留下“书林”的踪迹，这将是我們极感欣慰的憧憬。

《当代大学书林》，是一套综合性丛书，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心里学、伦理学、文化史、宗教哲学、科学哲学、艺术规律研究等广泛领域。以大专学生、研究生、广大自学青年为主要对象，同时也面向广大社会读者。

《当代大学书林》，以学术研究著作作为主体，也适当选入部分译著。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观点，我们的态度是：有益的，借鉴；有害的，批判。五光十色的世界，并不都是金子在闪光，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是我们要坚决剔出的。所谓“西方文化热”，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现象，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不懈的努力，重建东方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只有这样，它们才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先。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必将同步前进。《当代大学书林》愿作教育大军中的一个士卒，贡献我们应尽的力量。

不树桃李树书林，辛勤耕耘也成荫。愿我们的作者、编辑和广大读者互相支持、通力合作。同时，热切盼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 译 序

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 )是七十年代著名的美国语言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科学实在论的倡导者，与美国哲学家克里普克和唐纳兰共同建立了新指称理论。他于洛杉矶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西北大学和普斯林顿大学任教，196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科学哲学教授。1965年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普特南的研究成果有两部分。一是他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主要收在三本论文集中。《数学、物质和方法》，讨论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问题；《心灵、语言和实在》，探讨语言哲学和精神哲学问题；《实在论和理性》，研究意义和真理问题。另一部分是著作：《逻辑哲学》(1971)；《意义和道德科学》(1977)；《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最近又出版了一本新书《实在论面面观》(1987)，可以看作《理性、真理与历史》的续篇。

《理性、真理与历史》是普特南的一本有代表性的专著，书中系统地论证了他的科学实在论观点，并把这种观点贯穿于指称问题、心身问题、真理方面的事实和价值问题以及理性和历史问题的讨论之中。西方把他的观点称为“科学实在论”，倒不是因为他自己这样称呼，相反，他曾公开声明避免使用这个名称，以表明他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立场。七十年代时期，普特南在真理



## 2 理性、真理与历史

问题上也曾主张真理符合说，认为语言和世界之间有对应关系。在本书中，他抛弃了这种主张，并且严厉批判了以“神目观”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实在论，转向内部实在论。

在普特南看来，形而上学实在论是这样一种哲学观，认为“世界是由不依赖于心灵对象的某个总体构成的。只能有一个关于‘世界存在的方式’的真确而完备的描述。真理必须包括语词或思维记号与外部事物或事物集合之间的对应关系”（引自本书，下同）。与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方法不同，他认为，对于这种哲学观的错误，用逻辑方法和经验科学的方法都无法批驳，因为它是一种哲学观，必须用类似康德的先验方法的哲学论证才能揭露其错误。他认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实质上预设了一个神目真理观，它抹煞了人类的认识发展和现实生活的作用。按照这种观点，似乎可以假定人类是许多泡在盛有维持液的大缸里的缸中之脑，依靠思维把握世界，思维和语言记号内在地与对象相对应，因为记号本身具有神秘的力，自动指称对象。不过这种情形只有上帝看得见，是以上帝的眼光作出的假定，所以这是一种根本不依赖任何观察者的无目真理观。普特南把这种哲学观叫做“外部主义”哲学观，它假定的主体既无法指称外部对象，也无法说明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人类自身的存在，最终导致自我否定。

他认为，语言记号必须在使用者的概念构架内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对象’不可能不依赖于概念构架而存在。当我们引入不同的描述构架时，我们就把世界分割成一些对象。既然对象和记号对于描述构架来说都是内部的，我们就可以说出什么对象匹配什么记号。”对象依

赖于人们的认识而存在，世界是概念化的世界，人们不可能去认识、指称和描述自在的未受概念侵染的实在。因此，对象存在于概念构架之内，而不是存在于概念构架之外。

再者，外部主义哲学观坚持真理符合说，其根本缺陷并不是尚未找出语言和实在之间真实的对应关系，尚未找出那个唯一真的描述世界的理论，而是不晓得根本没有什么唯一真实的对象关系和唯一真的描述理论。普特南强调，他不否认语言与实在之间有对应关系，也不否认人们能够用理论描述世界。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语言和实在的对应关系，而在于这种对应关系太多，以致无法挑出哪一个对应关系是正确的。所以真理符合说站不住脚，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建立的各种唯一真的描述理论不是片面的就是错误的。

普特南把自己的哲学观叫做“内部主义哲学观，其特征是主张‘世界是由什么对象构成的？’这个问题，必须在一个理论的内部提出时，才是有意义的。……关于世界的‘真的’理论或描述不止有一个。内部主义者认为，‘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而不是我们的信念同不依赖于心灵的‘事实’之间符合”。他表示，真理融贯说、实用主义、多元论等等，都可以充作他的内部主义哲学观的名称，不过他的观点同这些名称过去所指的那些学派有所不同，确切地说，普特南试图建立一种把主客观两种因素相结合的学说，“这种观点至少在精神实质上是向伊曼努尔·康德的复归”。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即打破真理和理性问题上把主观性和客观性加以区分的二分法。由此可以看出，普特南对于实在论的批判，具有合理的一

#### 4 理性、真理与历史

面，尤其是他对于真理符合说的那种机械和片面的理解的批判，更是切中要害，对我们应当有所启发。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当然不会赞同割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走向极端，取消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甚至颠倒二者的关系，同样也是错误的。普特南向康德的复归，应该说是一种倒退。

普特南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打破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分法，提出价值事实的概念，把判定是不是事实的标准定为看接受它是否合理。他赞同地球人类中心说，认为真理与合理性这两个概念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真理就是理性上可接受性的理想化，但是真理不等同于理性上的可接受性，“一个陈述可以是理性上可接受的，同时又不是真的；这种实在论的直觉将保留在我的说明中”。

那么怎样说明合理性概念呢？普特南提出必须用他的历史方法。他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着的，合理性的概念本身就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他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以符号逻辑为基准的“理性重构”，也不完全赞同库恩等人的历史主义和富柯等人的结构主义，因为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教条，后者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都不合时宜。普特南打算走第三条路线，肯定合理性概念的合法地位，不参与反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坚持合理性标准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反对用僵死的原则解释它。在真理问题上，他既不同意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真理摹写说，即心灵单纯地“摹写”一个由唯一真的理论描述的世界；也不同意主观主义真理观，即心灵创造世界。他说，“心灵和世界共同构造了心灵和世界”。于是，事实和价值

之间的界限被打消了。他断言，“真理深深地依赖着近来已被称作‘价值’的东西”。

普特南强调真理具有价值属性，批判了实在论和主观主义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他从人类认识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点出发，设定了一个理想真理的极限概念。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但是，普特南的内部实在论和真理观并非象他所说，在形而上学实在论和主观相对主义之间不偏不依。他在本书的末尾说道：“在我为之辩护的构想之中，显然没有‘基础’这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合理性构想之间，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只有相互对话。可见，虽然他在书中着力批评了相对主义自我否定的错误，但是，最终未能脱离主观相对主义的窠臼。

这本书是美国近期兴起的科学实在论的代表著，其中涉及的哲学问题都是当前西方哲学界比较热门的课题，因此，在西方有着一定的影响。书中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本书译完初稿后，洪汉鼎同志不辞劳苦地看了全部译稿，并作了多处订正。刘大基同志看过部分章节，提出不少具体的意见。责任编辑陈骏同志不但做了大量编辑工作，而且，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为本书重新整理了索引。对于这些同志的热情帮助和鼓励，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误谬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译者**

1988年2月

## 序 言

K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打破许多二分法对哲学家及普通人思想的桎梏，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关于真理和理性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两种看法之间的二分法。我所说的现象是：思想家们一旦接受了象“客观性”和“主观性”这样的二分法——不仅把二者看成一对范畴，而且看作代表不同观点类型和思想风格的特征——他们就把这种二分法的术语大都看成意识形态的标签。今天，有许多哲学家（也许占大多数）都坚持真理“摹写”说的主张。按照这种学说，一个陈述只有在“符合（不依赖于心灵的）事实”的情况下才是真的。这派哲学家认为，相反的唯一选择就是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并且屈从于这样的看法：一切思维模式和一切思想观点都只能是主观的。一些勇敢的少数派哲学家（库恩，至少他的某些基调属于这派；费耶尔阿本德；还有象福柯那样一些杰出的大陆哲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给自己的哲学贴上相反的标签。他们一致认为，取代朴素的真理摹写说的学说把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甚至（库恩和费耶尔阿本德式的）科学理论看作主观的东西，而且他们已经极有魄力地着手提出一种相对主义的主观性观点。

哲学争论似乎表明，思想争论本身的名分未必不好，因为新的思想，即便在最精确的科学领域内，也常常同时受到带有强烈党派偏见的味道的采纳和攻击。甚至

X 在政治领域内，两派的极端对立加之意识形态的白热化，有时必然使问题的结局带有大是大非的严正性。但是总有一天，哲学和政治领域里的新思想会陈旧。过去富有挑战性的思想，现在成了意料之中的，并且令人感到厌倦，过去曾经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而且那时它的确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却不再考虑新的问题。现在，真理符合说同主观主义学说之间所进行的争论，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本书的前三章里，我试图阐释一种把主客观两种因素相结合的真理学说。这种观点至少在精神实质上是向伊曼努尔·康德的复归。这种观点主张，我们不必非得打着时代精神(Zeitgeist)或“格式塔转换”或意识形态的旗号，就能抛弃素朴的真理“摹写”说。

大略说来，我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在真理概念与合理性概念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更笼统地说，判定是不是事实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接受它是否合理。

(我的这一解释是相当严谨且毫不夸张的；因此，如果对这幅画是美的加以接受是合理的，那么这幅画是美的就是一个事实)。这种构想允许价值事实(value fact)存在。但是，理性上可接受性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一个陈述可以是理性上可接受的，同时又不是真的，这种实在论的直觉将保留在我的说明之中。

然而，我却不相信合理性是由一套不变的“准则”或“原则”来定义的。方法论原则同我们的世界观相联系，世界观包括我们对于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我们自身的看法，而且，方法论原则是因时而易的。因此，我同意主观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没有固定不变的、与历史

无关的并能够用来定义什么样才是合理的研究原则。但是，我从我们的理性构想是历史地发展着的这个事实出发，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本身可以是（或能够演变为）任何事物；我的观点也不会最终成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法国哲学家的“结构主义”的某种奇特混合。我认为，要么是和历史无关的永恒的合理性准则，要么是文化相对主义，这样的二分法已经过时了。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特点是，认为合理性并不局限于实验科学，它在实验科学之内和之外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我看来，这种构想具有实证主义的遗风，它的来源有二：一是认为科学世界是以某种形式由“经验材料”构成的；一是认为实验科学的术语是由“操作定义的”。我不想专门占用篇幅去批评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们的科学观已经遭到彻底的批判。但是，对于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材料”至少构成了我们部分知识的某种客观“基础”的看法，我将根据（第三章）我们关于真理与合理性问题的主张予以重新考察。

总之，我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心灵不单纯是“摹写”这样一个世界，它仅允许由一个唯一真的理论（One True Theory）来描述。但是，应该把我的观点同这种观点区分开：即心灵构造了这个世界（或者，心灵构造了这个世界后，把它置于由“方法论准则”和不依赖于心灵的“经验材料”硬性规定的制约之下）。如果一定要用隐喻式的语言，就请用这样的隐喻：心灵和世界共同构造了心灵和世界（或者，使这个隐喻更加黑格尔化：宇宙构造了一个在构造过程中与心灵共同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的宇宙）。

我对合理性解说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我试图表明，我们的合理性概念归根结底不过是我们关于人类兴盛的构想之一部分，即我们关于好(the good)的想法之一部分。真理深深地依赖着近来已被称作“价值”的东西（第六章）。我在前面谈到的关于合理性和历史的思想，同样适用于价值和历史。不存在给定的、与历史无关的、能够用来最终解释人类兴盛原因的一套“道德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不过是文化的和相对的东西。在我看来，既然当前真理理论的现状——当前流行的真理摹写说和真理的主观主义解释之间的根本对立——至少应对声名狼藉的“事实/价值”二分法负有部分责任，那么我们只要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修正我们对真理和合理性本身的说明，就能超越“事实/价值”的二分法。（按照一般的理解，这个二分法实质上使人们承诺了某种相对主义。）现行的真理观都是异化了的观点，它使人们丧失了自身与世界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把世界看成仅仅由从虚空中分离出来的基本原子组成（“物理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的描述收敛于那个唯一真的理论）；或者把世界看成仅仅由“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材料”组成（老经验主义的观点）；或者跟出于各种（主要是无意识的）理由所编造的一系列描述相反，全然否定存在着一个世界。我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概述有关非异化观点的一些主要思想。

我在赫伯特·斯宾塞讲座使用的讲稿《哲学家与人类理智》（1979年，牛津大学）与这本书的内容有些部分是相同的，正象那篇论文“如果上帝有死，那么所有人都有死(Si Dieu est mort, alors tout est permis)……（关于语言哲学的几点看法）”（载于1980年



《批判》杂志)一样,都是眼下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

在1978——1980这三年里,国家基金会拨发的研究经费\*资助了与本书有关的科研工作,我对此深表谢意。

托马斯·库恩和罗斯·普特南曾审阅过本书的提纲,并提出了富有才智的批评和贤明的忠告。我还得到了我的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包括奈德·布洛克、大卫·海尔曼、贾斯汀·莱伯,以及我在哈佛大学的讲座和研究班的学生们。本书中的几个章节曾经于1980年春在利马大学宣读过(这次旅行是在富布赖特委员会资助下得以成行的),第二章实际上是在利马逗留期间完成的。此间,我同利奥波多·恰普、阿尔伯托·科德罗·莱卡、亨里克斯·费尔南德兹、佛兰西斯科·米罗·奎萨达和乔治·塞卡达等人进行了讨论,使我获益非浅。全书(初稿)于1980年夏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讲座上宣讲过,我非常感谢那里的同事们(特别是威尔海姆·埃斯勒和雷纳·特拉普),并感谢热情的学生们。我还要感谢我的德国朋友们(尤其是迪特尔·亨利希、梅农·法斯宾德和沃尔夫冈·施太格缪勒),他们给我以鼓励并就本书进行了激动人心的讨论。

我特别应该向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全体同事致谢。近几年,我同尼克逊·古德曼就双方观点较为一致的方面进行了探讨。我刚写出本书的提纲,就看到了古德曼的《世界构成的方式》一书,拜读他的著作并就有关问

---

\* 请查阅《科学理论的评价:与形式研究方法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准字号SOC78-04276。